第一章

党项羌——西夏的主体民族

一、党项羌的由来

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是我国古代羌族中派生出的一支。“党项”一词，是中原汉族对这个少数民族的称谓，最早见于隋代的史书。吐蕃族称党项为“弭药”，党项羌族也自称“弭药”或“弭人”，北方的突厥族则称他们为“唐古特”（Tangut）。西夏辞书《文海杂类》中对“蕃”的解释为：“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有关“党项”一词的含义，学者们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高寒平旷之地”，有的认为是“荒野”或“二水之交”，有的认为是“广大草原”“野蛮人的原野”，也有的认为是“黑色的党项”之意。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项羌族的起源。

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早在汉代，羌族就已发展到150多个部落。西羌曾大量内迁于河陇及关中等地，这一时期的羌族在吐谷浑的东边建立了两个小政权：宕昌和邓至，但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权。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有的被吐谷浑所征服，有的逃居于川蜀西部的深山野谷中，有的从青海进入西藏。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项羌应该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各部发展而来的，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隋唐时期，党项羌族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至今青海河曲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中。“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诸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说的就是这一时期党项羌族的势力范围。党项羌族在唐周边的少数民族中仍然是一个力量相对弱小的民族，一直受到唐朝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在唐朝与吐蕃势力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中，党项羌是唐朝着意争取和笼络的对象，是唐朝羁縻政策实施较为成功的一例。

二、党项羌人

以游牧为生的党项人皮肤黧黑，在黎黑皮肤的衬托下，牙齿显得雪白，他们眼睛深陷，身材高大，剃秃发，戴耳环，穿戴毛毡、毛布和兽皮做成的衣服、皮靴，住的是毛毡帐篷，这样的帐篷便于随时拆迁。



黑水城出土卷轴画·阿弥陀佛来迎图中的男女二施主

党项羌族是一个骁勇劲悍的民族，“好勇善猎，日以兵马为务”。在党项羌族的文化习俗中崇尚武力，西夏流传的本民族谚语是这样赞

美他们的尚武精神的：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
心怯也别趴下，箭尽也别投降。
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
美人穿上皮袄，也不会变丑。
勇士坐在人后，也不会变弱。

党项羌人的复仇心理也十分强烈，“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实在没有能力复仇的人，就会请邻里帮忙完成复仇计划。如果双方的仇怨得以和平解决，就要举行盟誓仪式，并发毒誓。

在婚姻方面，党项人保留了原始的收继婚制度和原始的性爱自由的习俗，即氏族内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允许被丈夫的兄弟或侄子娶为妻子。“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爱到情深，两人可以身殉情，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党项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一丧葬习俗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

“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是对早期党项羌族居住地的生动描述。由于所居地气候恶劣、干燥，党项人过着不懂农耕，不种庄稼，逐水草而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较差，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养殖牦牛、马、驴、

羊，以供食用；居住在随时可拆卸的帐篷中；没有文字；没有历法，只依靠一年一度的草木枯荣来计算年岁日月。他们以姓氏或居住地作为部落的名称，“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同姓部落又分为一些大小不一、不相统一的部落。在众多的部落中，主要有 8 个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他们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拓跋氏的先祖。

三、叛服无常

回顾中国的历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总是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党项羌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走不出这种特定的模式。党项羌虽居于西北高寒之地，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内地的北周政权发生关系。北周天和元年（566 年），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乱而率兵平叛，这是史籍记载党项羌与内地政权发生关系的开始。隋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令将率兵击败吐谷浑和党项，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服于隋朝。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族已经迁移到了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西夏文古诗《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这里。到了隋末，党项诸部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唐朝建立之初，仅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吐谷浑和党项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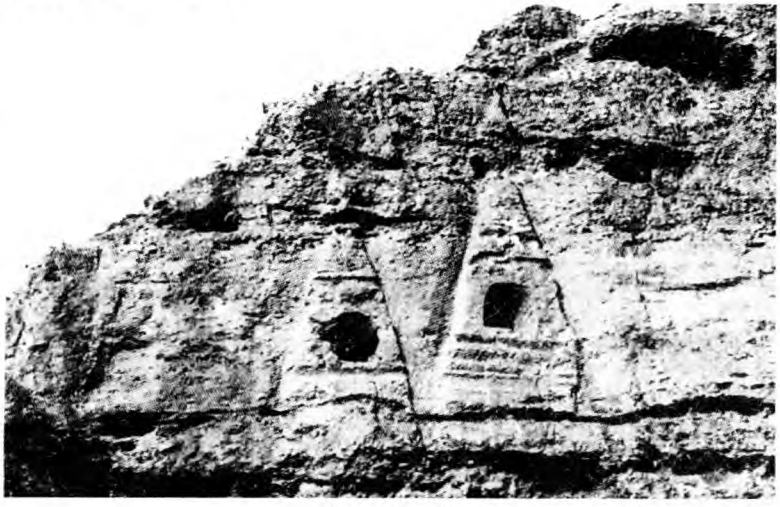
不断侵扰西北各州。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朝桥州，唐朝益州道行台轨与抚州刺史蒋善合联合抗击，党项与吐谷浑兵败离去。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党项与吐谷浑占据山顶，箭如雨下，柴绍命人弹奏胡琵琶，让二女子翩翩伴舞，有意吸引敌人注意力，然后秘遣精兵从后面进攻，党项与吐谷浑大败，弃兵甲逃走。此后的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多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损。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党项向唐遣使两次朝贡：一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一起遣使向唐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独自遣使朝贡。他们向唐朝朝贡主要是为了通过与唐朝的贸易、互市来获取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互市，党项羌族才能用他们的牲畜和畜牧品换得日常生活用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稳定下来，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李世民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归附于唐朝。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也归附于唐朝，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了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新增设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党项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他就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氏的先祖。

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贺兰山石刻塔

四、举族大迁徙——党项羌发展的新契机

在唐朝，党项羌族有过两次大的迁徙，这两次大规模的内迁是唐同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失败的直接产物。唐朝初年，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及西域的斗争，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化。唐政府想利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和吐谷浑来遏制吐蕃的北上，而吐蕃也借唐政府的策略找到了用兵的借口，发兵攻击吐谷浑和党项羌所居地，尽收党项及诸羌之地。吐蕃的强大攻势使唐政府屈服，党项羌正是在唐与吐蕃争夺丝路及西域失败的情况下，被迫内迁的。

从 7 世纪中后期到 8 世纪中后期，党项羌大规模的迁徙有两次。第一次迁徙在咸亨元年（670 年）左右，党项羌族不堪忍受吐蕃的侵扰，向唐王朝请求内徙。唐朝答应了党项羌族的请求，允许他们由原居地松州迁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并将原来设置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到庆州，用来安置内迁的党项羌各部族。党项羌的这次内迁不是唐朝的安排，而是党项羌族人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北内迁。第二次内迁是唐广德二年（764 年），“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日衰，吐蕃乘唐朝西北边防空虚之际攻占河西、陇右一带，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诸部落在吐蕃的诱逼下，常联合侵扰唐朝。唐朝大将郭子仪认为如此长久下去，会酿成更大的边患，便上疏朝廷请求将静边州、夏州等地的六府党项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的沙漠地

带居住。内徙的党项羌打破了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按地域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居于庆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乞梅部落，因其位于陇山之东，所以被称为“东山部落”；居于银州、夏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朝光部落，因为其居地“地唯沙碛，俗谓平夏”，所以被称为“平夏部落”；居于绥州、延州一带的称为六府部。平夏部落就是后来的西夏帝王的先祖部落。

党项羌族的迁徙长达200多年，直到唐朝末年才基本结束。内迁使党项羌的居住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为党项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党项部落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西北地区，党项羌民族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除原有的八大氏族外，又出现了破丑氏、把利氏、簿备氏、藏才族王氏、折氏等新的氏族。

五、始学农耕

唐朝对内徙的党项羌实行了“羁縻府州制”。党项羌虽有叛乱，但总体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这种环境为党项羌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内徙后的党项羌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内徙党项羌的原氏族、部落的血统关系逐渐松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向地域关系转化。同一个地区，不同族姓的部落有了联合的趋势，形成了以地域为名的部落集团。同时，在部落或部落集团内出现了势力强劲的大姓，这些大姓的部落首领自然而然地担当了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的首领，有

的还兼任唐州刺史、部落游弈使等官职。

党项羌的内迁都是从战乱频繁的地区迁往较为和平稳定的地区，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沙碛高寒地区迁往水草肥美、适合农牧的内陆西北地区。尽管在迁徙的过程中，党项各族原有的牲畜、人口、财产等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能迁徙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农业生产、畜牧，这对于党项羌族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党项羌内徙后所居住的河套一带是农业发达、水草肥美、易于畜牧的地区，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是极为有力的。唐玄宗时，唐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党项羌的羁縻统治，巩固边防，“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鼓励党项羌族人民定居，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唐朝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党项羌人逐渐开始学习农耕技术。

虽然有部分党项羌人已逐渐开始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但此时党项羌族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对于战则为骑、和则为牧的党项羌族而言，马就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也是他们与邻近民族进行交换生活用品的重要商品之一。内徙的党项羌与内地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主要以自己的牲畜来换取汉族的丝织品、珍珠、银、铜、铁和武器等生活用品。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中曾描写过这一现象：“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塬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这里所写的盐州，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五原，在今内蒙临河境内，鄜州在今陕西富县，都是西夏的地域范围。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徙的党项羌正是在这种与他族的不断交往中，逐渐发展、强盛起来的。除与汉族交往外，内徙的党项羌还与吐蕃、吐谷浑、室韦等族有密切的往来。由于党项、吐谷浑、室韦等都处于杂居状态，三者的社会发展情况相近，互相影响较深。河套地区还杂居一些原突厥等族人口，他们同党项羌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不可忽视，党项羌无论从风俗或是语言文化方面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这也成为后来内徙的党项羌所建立的西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无不带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原因。





岩画：征战图、人面像和羊

六、称雄一方

拓跋部是党项羌各部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因此受到唐王朝的高度重视。当初，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在归附唐朝后，被授予“西戎都督”，赐国姓“李”，这进一步提升了拓跋部在党项羌各部中的威望。后来，在党项羌内徙大潮中，拓跋部较为完整地从松州地区迁往平夏一带，成为平夏部落中最强的一支，继续保持其在党项羌中的强族地位。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因为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而被封为“西平公”，赠“灵州都督”。党项拓跋部长期居住在西

北银、夏一带，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

唐广明元年(880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入长安城，唐僖宗仓皇出逃，一时间，国中大乱。唐王朝统治者倾全力镇压农民起义，除调用汉族地主武装力量外，还征调沙陀、党项等沿边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帮助镇压农民起义。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也在被征之列，他率领数万党项兵、汉兵南下鄜州，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结成同盟，向长安进军。拓跋思恭派弟弟思忠迎战农民起义军。激战中，拓跋思忠战死。黄巢起义被镇压后，拓跋思恭因响应唐僖宗的号召，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881年被任命为夏州节度使，封为“夏国公”，又赐“李”氏国姓。拓跋思恭由一个党项羌族酋长摇身一变成为朝廷任命的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氏被唐王朝任命为节度使的开始。从此之后，党项羌族拓跋氏首领世袭此职。唐朝对拓跋思恭的加官进爵，对于正在走向强大的党项羌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拓跋部除有夏州之外，他们还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之机，占据了银、静等州，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拓跋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也就建立起来了。

七、曲折发展

崛起的党项拓跋部一方面逐渐成为分散于各地的党项羌诸部的核心，另一方面又高居于党项诸部之上，成为统治阶层，并迅速地汉化，开始与其他党项诸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夏州割据政权一方面对唐朝基本上做到了“有征必至，无役不

从”，唯朝廷马首是瞻，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夏州政权的统治者还趁各藩镇在河南、关中地区激烈角逐之机，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唐王朝灭亡前的十几年间，拓跋部的统治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夏、绥、银、宥、盐、鄜、坊、丹、延九州地区，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数县，几乎逼近关中北部边缘，成为中国西部一支强大的藩镇割据势力。

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代时的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遭到两次大的冲击。

第一次是后唐对党项割据势力进行扫除。后唐长兴四年（933年）二月，党项拓跋部李仁福死，他的儿子李彝超继承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后唐的统治者就是发迹于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们恐惧长期占据夏州的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向南侵入关中，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乘李仁福刚死之机，企图将李彝超调离夏州，同时任命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与李彝超对调，以此削弱党项李氏的势力。但夏州是党项拓跋部从唐朝以来就割据的地方，他们世代经营，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李彝超借口百姓挽留，不能按时赴延州就任，拒不离开夏州。七月，后唐军与李彝超的部落兵激战于夏州，夏州城是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时的都城，城墙用土垒筑，坚如磐石，攻凿不动，后唐军队无法进城。李彝超率弟弟彝殷登上城墙，对后唐将领说：“夏州是一个孤单弱小之镇，不必烦劳王师攻取，白白地耗费国家的军饷，即或是攻取了也不算上威武。烦劳将军为我上报天子，容我另想办法。”李彝超派出骑兵，抄

掠了后唐军队的粮草和攻城工具。后唐军队攻城两月不克，又丧失了粮草，野外又无水草可供战马饮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后唐明宗无可奈何，只得下令退兵。李彝超趁后唐军队撤退之时，派军队追击，后唐军队大败而归，党项李氏获胜。但经过战争，夏州割据势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后唐对夏州政权的“移镇”事件及其结果，使夏州政权“益轻朝廷”，对中原王朝的离心自立倾向更加严重。夏州政权对中原王朝已不像以前那样唯命是从了，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中原王朝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次削弱是党项割据势力的内讧。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绥州刺史李彝敏勾结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攻袭夏州。李彝殷发觉后，先下手为强，将拓跋崇斌斩首，并出兵攻击李彝敏。这两次冲击虽使党项李氏割据势力有所削弱，但其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就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夏州一带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党项李氏割据势力名义上虽先后依附于内地的各个王朝，接受其封号，定期朝贡，实际上却利用分裂混战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特别是在挫败了后



木缘塔

唐“移除”阴谋之后，参与内地割据势力的角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宋立国后，李彝殷为了使自己的割据政权不受到宋的威胁，主动对宋太祖示好进贡。宋朝对夏州割据政权也采取了“安抚”政策。宋太祖命玉工为李彝兴（李彝殷为避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特制一条玉带，并授予李彝兴太尉官职。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逝世，宋太祖还追封李彝兴为“夏王”，并下令废朝三日，以示痛悼。宋太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北宋刚刚立国，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局势不稳定，还不能扩大对夏州政权的矛盾。北宋政权逐渐巩固后，以唐藩镇割据叛乱为鉴，开始采用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地方割据势力。此时夏州割据政权的掌权者为李继捧，李继捧承袭兄位曾在党项羌族贵族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李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坚决反对李继捧继位，他上表宋朝：“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企图借宋朝之手解除李继捧的夏州节度使之职。宋朝早已有消除夏州割据势力之意，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李克文上疏正合宋朝的心意，于是宋朝顺水推舟，命令李继捧入朝。夏州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入朝，并向宋献出了党项平夏部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至此，夏州割据政权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期。

八、举旗反宋　重建政权

宋朝削除党项羌族世代割据夏州的措施，对巩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实力雄厚的夏州政权而言，却激化了民族矛盾。就在李继捧向宋朝献地称臣的同时，他的族弟李继迁举旗自立，走上了反抗宋朝的道路，再一次改变了宋朝西北的政治局势。李继迁反宋的这一时期，是党项夏州割据政权由削弱转向复兴的时期。

李继迁（963 年~1004 年），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的儿子，其高祖是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据史料记载，继迁“生而有齿，勇悍有谋”。年幼的时候就以“擅射骑，饶智数”而闻名乡里。宋开宝七年（974 年），李继迁年仅 11 岁时，有一天，他率众骑马出猎，在山路上遇见一只斑斓猛虎，随从们都惊恐万分，吓得不知所措，李继迁却处乱不惊，他一面令众人躲到松柏林中，一面自己爬到一棵大树上，引弓而发，一箭射中正向他扑过来的猛虎，猛虎当场毙命。这件事在党项羌族中广为传颂，李继迁由此名声大振。定难军李克睿欣赏李继迁的才能，授予他“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一职。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发生了李继捧入朝献夏州等地的事件。当时李继迁在银州，他反对李继捧入朝献地的举措，听取了谋士张浦“避走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建议，向宋朝诈称自己的乳母去世，要到郊外去埋葬，将兵器藏在灵柩之中，率数十名亲信逃出了银州，到了离夏州东北 300 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市境内），以此为基地，走上了反

宋的道路。

今天的地斤泽已是沙石遍地，但是1000多年前却是水草肥美、牛羊成群、毡帐连片，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也是党项羌族人的聚居地。地斤泽的党项人用新鲜的马奶酒和羊羔肉热情地欢迎李继迁的归来。李继迁一到地斤泽，便着手准备反宋的工作。他首先利用民族血缘纽带关系，供奉先祖拓跋思忠的画像，党项羌族各部族见到思忠的画像都泣不成声，纷纷跪拜，李继迁一时集合了许多的党项部落。为了得到更多党项羌族豪酋的支持和联盟，李继迁又与一些党项豪酋结亲，使投附于他的帐下的党项羌部众越来越多。得到了党项羌旧部的支持后，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到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开始对宋进行多次用兵，不断攻掠宋的夏、银、麟、会等州。但是，由于党项诸部力量分散，又未经过正规战斗的训练，因而在宋朝正规军的进攻下，屡遭失败，使党项诸部有的降服，有的溃散。惨痛的失败使李继迁认识到不争取辽朝的支持，难以实现武力逼迫宋朝承认其割据，于是他对部众说："我们至今不能光复旧业，反而遭致惨败，看来仅凭我们自己，兵单力弱，不能成势。现在北方耶律氏正强，我想借他们的援助，以图光复大业。"从此走上了



李继迁寨

联辽抗宋的道路。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李继迁遣使向辽称臣，辽朝原本就想借李氏割据势力牵制宋朝，因此，就做顺水人情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5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同时，还授李继迁的弟弟李继冲为副使。李继迁在经过一年的整顿和辽朝的帮助后，势力日增，重新对宋朝的西北边境构成了威胁。

宋朝面对这种局势，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来消除李继迁的反叛势力。宋太宗于端拱元年（988年），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任命拓跋部李继捧为夏州刺使、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赵保忠”，将夏、绥、银、宥、静5州的钱、帛、粟、田园都赐予赵保忠。宋朝本希望用此方法来让李继捧去安抚李继迁，让李继迁放弃反抗，但事态的发展却不以宋朝的意志为转移。赵保忠首鼠两端，与李继迁、辽国互相联络，李继迁仍不断骚扰宋的会州、夏州，并且兵不血刃地取得了宋的银、绥二州。在安抚政策无效的情况下，宋朝又采取了对李继迁经济封锁的办法，想以此困毙李继迁及反叛的党项诸部。原平夏党项诸部地瘠民贫，多贩运今宁夏盐池县附近出产的青白盐到陕、甘等地，再换取谷麦为生。宋朝对李继迁禁青白盐，一是为了断绝党项诸部的经济来源，以困李继迁；二是以山西解盐运销陕、甘，朝廷可获得大利，一举两得。但是宋朝的封锁政策不但没有困住李继迁，反而激化了宋与党项诸部之间的民族矛盾，使原已归附朝廷的部分党项羌又倒向了李继迁一边，宋朝无奈，最后只能取消这一禁令。

宋朝从淳化年间开始，因对辽作战的失利，开始改变对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